

城市新移民: 旅游劳务移民及相关理论方法^{*}

洪颖, 王晨娜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近些年来, 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旅游劳务移民(tourism labor migrants, TLM)的概念、特征、分类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为研究旅游劳务移民这一新移民群体初步搭建了一个基础性平台。但既有研究大多是基于旅游移民或劳务移民的宏观层面上展开论述, 缺乏应有的概念内涵及对中国具体国情的考量。如何对旅游劳务移民这种衍生的城市新移民类型进行深入的研究, 还需要结合旅游相关产业的特性做进一步的探讨, 尤其应着力结合能调动移民的主体能动性的一些因素来进行考量。

[关键词] 劳务移民; 旅游劳务移民; 移民理论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1)03-0144-07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面全球化, 出现了多种衍生的移民类型, 如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劳务移民、高考移民、库区移民、灾后移民、季节性移民、生活方式移民、旅游移民等, 移民的形态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相应的, 各种移民理论层出不穷, 出现了大量的概念、模型与分析框架。随着旅游业在全球的发展, 以及旅游行为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日益普遍的嵌入, 旅游与全球人口的流动紧密结合起来, 并在这一过程中催发了多种与旅游行为相关的移民类型。本文所关注的旅游劳务移民由旅游地迅速发展的经济带动出现,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移民的重要类型之一。据统计, 2002年末我国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已达612.63万人。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 202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将居世界第一位, 这可增加约3500万个就业岗位。^[1]巨大的需求潜力将引起旅游劳工的大量迁移, 并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学界, 探讨的问题有: 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宏观、微观原因; 旅游劳务移民概念、特征、类型; 以及旅游劳务移民对旅游地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

等。我国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为数不多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是涉及旅游劳务移民的类型层次、功能作用的讨论, 对旅游劳务移民的行为特征、转移模式、从业感知的研究, 旅游劳务移民及其对旅游地及劳务输出地产生的影响分析等, 并尝试探讨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研究的具体方法体系。

上述研究既有定量分析, 也有定性研究, 还有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取向, 大致呈现了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研究的基础概念和分析思路。但不可否认, 既有的研究只是初步涉及旅游劳务移民这一领域, 其中尚存一些问题需要辨析, 结合中国国情, 其理论探讨及实践指导价值还可以有进一步开掘拓展的空间。

一、旅游劳务移民相关研究概观

(一) 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的内涵界定

有关旅游劳务移民, 一般都将其定位于因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相关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短缺而产生的从“外地”引入、吸纳劳力所引起的人口迁移。如, 瑞典学者Linda Lundmark指出, 当大众旅游发展到一定规模时, 会出现劳动力数量不足和结构不平衡的现象, 这会导致劳动力向旅游地

* [收稿日期] 2010-10-11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年度项目“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劳工移民群体研究”阶段性成果(KW080099)。

[作者简介] 洪颖(1975—), 女, 云南昆明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大量迁移,并把由这种原因导致的人口迁移现象称为旅游劳务移民。^[2]这一界定强调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带动了劳务输出人员向该地区的迁移,但对这批人员的居留时间问题未置说辞。相应的,我国学者杨钊根据对九华山旅游劳工移民的跟踪研究,将旅游劳务移民定义为:由于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本地旅游劳工出现数量上的不足或结构上的不调,从而引起旅游地以外的劳务迁入旅游地从事旅游行业,且从业时间超过一定期限的移民。^[3]此定义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群体的认定中,移入地本土劳力的缺失性、劳务移民来源的异地性、从事职业的专门性以及移入地居留的长期性等要素,把立论的重心放在了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外在动因方面,忽略了旅游劳务移民迁移的内在动因的分析;同时,对于“异地”范围或界限语焉不详,导致在核心旅游地周边区域从事旅游相关产业的移民群体被学术话语所遮蔽。

而来自英国学者 Edith Szivas 等人的一种基于劳力迁移动力调查的解释认为,旅游劳务移民是一种生活方式(移民),^①认为人们为了寻求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活状态,自愿放弃现有的工作生活环境而迁移到景色优美的旅游地居住、工作和生活。^[4]这一论调的提出,迥异于既往那种第三人称的判断立场,从移民自身价值衡量出发,将个人的自主适应性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张力充分揭示出来,以一种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彰显出人的自我掌控姿态,从而在学界同行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显而易见,此观念的提出是奠基于经济状况较好的瑞士山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旅游劳务移民来说,放弃现有工作而把去旅游地定居工作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来实践的人群毕竟是少数。所以,这一提法更具有区域性或旅游经济发展的层次性特质,其普适性是成问题的。

因此,杨钊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论著的总结归纳,又给出了关于旅游劳务移民多维度、修正性的群像描述:动向上,旅游劳务移民的流向既可以是单向、永久性的,也可以是多向或季节性的;迁移空间上,他们大多数由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

迁移,且以寻找生活机会为目的;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上,旅游劳务移民的迁移紧随着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自觉融合。^[5]此定义路径提醒研究者,理论和其运用对象的匹配适用性是要基于地方化考量修正的。

(二)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特征的研究

事实上,当无法给出一个有效的逻辑界定时,学者们往往更乐于在“反本质主义”的大旗鼓下开展描述性工作。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的行为特征,A. J. Burkart 和 S. Medlik 提出了三点:第一,有一处比较正规的住宅;第二,旅游行为与劳务输出行为相结合;第三,旅游劳务移民有定期或不定期返乡意图。^[6]可见,其强调旅游劳务移民除了在旅游地定居生活外还要以劳务输出和产出价值为特点,同时,用“不定期返乡意图”区分了旅游劳务移民和一般移民。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也许这种陈述仍然会被诟病缺乏对居留的一个时限界定。但无奈的是,一方面因各国移民政策相关规定的不同而不便一概而论,另一方面如果为满足学术知识生产的需求而采用国际上对“移民”的通用计算标准——“超过6个月的定居时间”——为旅游劳务移民的时间性限定,又难免会忽视对频繁往来于旅游地进行商贸、餐饮等交叉性服务的劳务迁移群体的研究。因此,笔者以为,在这里采用概念化的修辞表达要比给出确定的时间限度更合理,涉及具体研究时,可依据地区规定及样本统计质量而做出一个说明性的评估即可。

Hall 和 Page 对旅游的三个特征分析,为我们研究旅游劳务移民的内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三个特性是:一,空间上的异地性,指旅游行为要发生在日常定居地之外;二,时间上的短暂性,指旅游者经过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后将返回原居住地;三,动机上的非定居性,指旅游者不是出于在旅游地永久定居和就业获取报酬为目的。^[7]此特征的价值在于强调了旅游者的返回意图和非永久定居的特性,这也正是旅游劳务移民区别于旅游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对旅游者的特征分析,排除了其在目的地就业以获取报酬的情况,

^① Foster, Murphy, Halseth, Rosenberg, Flynn, Marsden, Riebsame, Williams 等几位学者通过对第二居住地的研究提出了生活方式移民这个概念。生活方式移民,又称第二居住地移民。对处于人生特殊阶段的人来说,移民到乡村或城市的乡村腹地寻找适合游憩和休闲的宜人环境定居是典型的一种生活方式移民。参见杨钊、陆林:《国外旅游移民研究综述》,载《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7)。

从而凸显了旅游者与在旅游地非永久性定居的劳工(旅游劳务移民)的区别。前者以在旅游地消费为目的,后者以在旅游地获取收入为目的。但也要注意到此分析对一些具有混合动机的情况的遗漏,如背包兼打工的旅游者,休闲兼寻找工作的“迁移旅游工作者”(migrant tourist worker)等。作为补充修正,2000年,Williams与Hall合作发表Tourism and Migration: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一文,把旅游劳务移民的特征补充概括为空间上的异地性、时间上的长期性(区别于旅游者时间上的短暂性)和动机上的经济性。^[8]通过强调旅游劳务移民在旅游地就业以获取生活费用这一经济动机,不但避免了此前标举短暂性“非定居”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也把被动输入劳务的贫困人口和主动输入劳务或资本的有钱、有闲阶级包括在了旅游劳务移民的分析概念中,从而更有效切合了旅游劳务移民的实际行为状况。

此外,鉴于俄国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关于确定地区外籍劳务需求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劳务移民必须持有劳务输出国的劳务证明,有卫生、社会保障部门对劳工年龄、工龄、健康等状况的限制性规定,以及相关的身份户籍证明等,依此,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补充发挥为:旅游劳务移民身份的确定必须有户口的转移、同时伴有享受当地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服务等条件,才能称为旅游劳务移民。但这种划分也会导致对边缘性劳务移民群体样本的遗漏。

(三) 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的类型划分

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的类型,被大量提及的分类是King的研究。他综合了旅游劳务移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受教育层次等因素而将其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旅游企业主移民和高技能管理人员移民,如国际饭店和航空公司的管理层;第二类是位于中间旅游劳务移民,如导游和旅行社代理人;第三类是处于底层的(技术)工人移民,他们以满足基本生存为目的。^[9]杨钊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归纳,又进一步将上述第一类旅游企业主移民细分为3个亚类型:一,服务于特定国家的旅游者或定居者的。这些企业主移民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背景,能向来自于故土的旅游者出售“本土化”的商品和服务,并能发挥母语在移民地的优势;二,寻找机会者。即被旅游地相对较

高的旅游消费特性吸引而来的;三,寻求快乐者。这些人被旅游地良好的人居环境所吸引,并不特别考虑旅游企业的发展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此类高层次的旅游劳务移民其实具有多重的移民身份特征:他们既是生活方式移民,又是劳务(资本)输出移民,同时还是以旅游地为移民目的地的旅游移民。

此外,依据不同的研究主题、针对成果提交评估的不同部门,还形成了多样化的旅游劳务移民分类尝试:如以时间,可以划分为季节性和永久性的;以国界,可以划分为国际的和国内的;以法律上的登记手续,可以划分为登记的和未登记的;不一而足。

当然,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类型的划分方面研究还存在一定缺陷,尤其国内学界,总体还停留在译介国外相关研究的层次上,缺乏对各种旅游劳务移民群体长期的实际跟踪调查,特别缺乏对少数民族移民群体样本的关注。

(四) 关于旅游劳务移民对旅游地影响的研究

Williams和Hall指出,有关旅游劳务输出与旅游地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被人们忽视且需要强化的概念。他们认为旅游劳务移民对旅游地主要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形成了“VFR”模式的旅游形态(Visit friends and relatives);二是旅游劳务移民的经历为以后的退休移民或生活方式移民提供了选择依据。^[10]他们倡导关注旅游劳务输出与旅游地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同时,对应于其关于旅游劳务移民行为特征要素的归纳,将旅游劳务移民与探亲访友、退休移民等建构起了富有学理探讨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逻辑关联。

Rodriguez则认为,旅游劳务移民对旅游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旅游劳务移民在旅游地的居住时间比旅游者长,这可以提高旅游地设施的利用率,促进当地经济市场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以劳务输出为主导的旅游劳务移民,可以缓解旅游地淡、旺季的劳动力需求矛盾,增加就业,填补当地旅游劳工总量的不足,减少当地劳务市场的压力;第三,有利于扩大旅游地物资和信息的辐射范围,促进旅游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大量旅游劳务移民的涌入可能造成本地人就业不充分或季

节性失业;第二,如果大量上层旅游劳务移民进入旅游地,会造成当地人只能从事旅游相关的外围、低端职业,从而引起本地人的不满。^[11]

这样一些富于启发性的思考大致涵盖了旅游劳务移民实际运作中的情形,也成为学界从事相关社会研究的侧重点。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既有的成果呈现出一边倒向“旅游劳务移民→移入地”此单向度的影响研究,鲜见关于移入地对旅游劳务移民行为的限制性影响探讨——事实上,在经济相关因素外,历史人文方面的积淀特色也始终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露出来,进而对“外来者”产生牵制。故而,旅游劳务移民与移入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乃至与劳力移出地之间的关联,都应被广泛纳入研究视阈。

二、多种移民理论对旅游劳务移民动因的适用评析

(一) 推拉理论

关于人口流动研究的最重要理论当然是“推拉理论”。其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推”和“拉”的双重作用决定了劳工移民的存在和发展。鉴于该理论的广泛周知性,于此不再赘述其理论得失,而仅就其对旅游劳务移民的形成的阐释力做讨论。

作为新兴产业,区域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商机吸引大量其他地区的劳工进入当地旅游市场。Williams和Hall指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范围和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这两个要素共同决定了劳动力从其他部门、地区转移到旅游地的程度和范围。^[12]实际上,这也是推拉理论的一种表述。此外,Oigenblick、Kirschenbaum、Truly也都运用了推拉理论对旅游移民产生的动力机制和类型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杨钊等人指出,旅游劳务移民对新职业的适应和选择过程、对异地生活的评价过程等因素能够反映出推拉作用的程度和旅游地劳务市场的稳定程度。^[13]

推拉理论呈现了劳务人员流动的最基本规律,但我们需要注意仅把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动机简单归因为被“推”和“拉”的“理性选择”过程,容易忽视旅游劳务移民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并且,为什么在相似的“推拉”因素作用下,同一移民群体中的人走上了不同的移民道路?为什么在

“推拉”因素发生变化后,劳务移民的行为却并没有立刻终止?为什么在原有的“推拉”因素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时,劳务移民的数量却明显减少或增多了。在对诸如此类现象的解释中,推拉理论都缺乏解释力。

(二) 劳动力供需理论

1954年,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利用无穷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劳务移民产生的原因。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快且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国家比经济发展慢且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可得到更高的工资收入,这就促进了劳动力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

从旅游劳务移民转移模式来看,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旅游地周边的剩余劳动力,二是旅游地以外的外地劳动力。第一种旅游劳务流动的产生,是受到当地旅游业门槛低、前景好、类型多、收益快,以及职业自由度大、流动频率高等特性的吸引。第二种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由于旅游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较低,因而本地劳工不愿进入,但这种较低的经济收入和不高的社会地位恰恰满足了外地劳工对工资水平和职业地位的期望。其二,受旅游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导致旅游地劳工总量供应不足,因而需引进大量外地劳工。其三,旅游地教育能力不能提供满足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专业人员,从而自外引进。

供需理论引入了对旅游地职业供需结构的分析,可以从不同的劳务转移模式来理解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原因和迁移特点,其着眼宏观,有利于我们把握对旅游劳务移民群体整体特征的认识。但在探讨一些相对个体化、小规模群体的移民类型时,却体现出一些不足。如,反观劳力移出地社区,其中成为旅游劳务移民的往往并不是那里处于社会最底层、不掌握任何社会资源的贫困人群。这说明,经济差异需求的刺激是劳务移民的产生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再者,供需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生活在相似社区中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移民倾向。如,为什么居住在高寒山区的居民通常倾向于移居到就近的城市,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更好、就业机会更多的发达城市?这些问题值得深思。针对这个问题,有学者引入物理学概念“距离衰减规律”(attenuation distance)以

解释旅游劳务移民群体对迁移地的选择。^[14]该概念认为通常情况下,距离越近,分布概率越大,距离越远,流量可能性越小,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劳务移民倾向就近在旅游地择业,而非涌向经济条件更好的发达地区。尽管如此,此概念仍不足以说明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复杂原因。

(三) 移民家庭化理论

移民家庭化的基本含义有两层:一是指劳务移民在流动过程中组成家庭;二是指某些劳务移民家庭由一个或部分家庭成员迁移转变为整个家庭迁移。从钟摆式流动到候鸟式迁移再到家庭化移民,移民家庭化已经成为当前移民的一种显著趋势。格勒米那·贾瑟(Guillermina Jasso)和马克·罗森茨维格(Mark Rosenzweig)研究表明,每个新移民移居10年后平均会带入1.2个“劳工类”新移民迁入移居地。^[15]旅游劳务移民家庭成员两地分离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以及在子女教育上的角色缺位等都是造成劳务移民出现家庭化流动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的一些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移民家庭化”现象,他们成为城镇人口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

移民家庭化理论承袭了人们认为集体行动会使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思想,认为迁移行为不仅要使迁移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为移民家庭提供减小风险和增加资本的效益。在中国,许多贫困家庭常常有意识地利用外出务工即劳务迁移来增加家庭的效益机会或减轻家庭风险,以期增加家庭的绝对收入。就算在“绝对经济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也可增加其“相对成功感”或提高在当地的社会地位。

移民家庭化理论没有将劳务移民产生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强调家庭因素对移民行为选择的决定作用,关注移民汇款对留守家庭成员的意义以及移民家庭与周围环境复杂的互动关系。此理论或多或少地弥补了劳动力供需理论的缺陷,但仅从移民家庭内部考察移民的动机,适用范围较小;再者,对于复杂、长期或者不稳定的旅游劳务移民案例缺乏较强的解释性,因此,运用此理论到旅游劳务移民研究时,还应加以具体的修正和提炼。

(四) 移民网络理论

当代有关劳务移民的研究中,移民网络说也

被认为有着相当的阐释力。在布迪厄看来,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时,这种关系就会成为他实际或潜在拥有的资源。^[15]张晓青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亲缘、地缘、乡缘、情缘等”。^[16]唐灿、冯小双通过对“河南村”流动农民的研究发现,因为有了移民网络的存在,使流动农民的流向有了质和量上的差别。其移民网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种关系上:一是“亲哥们儿弟兄”、“把兄弟”等亲缘、地缘社会关系,二是“顶用的”、“能办上事的”互利型社会关系。与亲缘、地缘关系间的互助极少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不同,“顶用的”、“能办上事的”社会关系则多半以交换手段在行业内或居住地之间发展建立,具有一定的实效性和互利性。^[17]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移民网络的不断扩大,来源于同一地区的移民对移居地的选择不再直接与经济、政治、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以及家庭风险等条件直接相关,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在移民网络中所积攒的社会资本。通过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移民间的各种信息得以准确、广泛、迅速地传播,从而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并不断强化了移民群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因此,移民网络在加强移民彼此间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时,还成为一种能赚钱、投资和储存的“资本”。

当大量迁移者在迁入某地定居时就可能自发形成移民网络,网络会促使迁移不断进行且推动规模不断扩大。这就增加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同乡人迁移的可能性。格勒米那·贾瑟(Guillermina Jasso)和马克·罗森茨维格(Mark Rosenzweig)对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的研究表明,每个移民的迁移经历都成为后来移民的资源,通过为后来移民牵线搭桥,不断扩大和发展了移民网络。^[18]Rodriguez的研究也认为形成一定的移民群体和一定的区域影响是构成劳务移民的两个基本要素。^[19]

移民网络说虽不能解释移民行为最初发生的原因,但却可以说明移民延绵不绝的原因,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移民动向。

(五) 心理地图理论

从微观上分析,Oigenblick L和Kirschenbaum A通过引入帮助盲人寻找目的地的“心理地图”(Psychological map)概念,指出旅游者先期

的旅游经历潜在地影响着他们的移民决定,即旅游经历会在旅游者心中构成一张“印象地图”,它成为移民者了解移居城市的重要信息源之一。^[20]此外,Warnes对西班牙季节性移民的研究也发现,先前的“假日旅游”经历,常使退休移民形成“心理地图”,从心理上决定了他们对移民目的地的选择。^[21]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旅游(经历)本身已成为构成移民“心理地图”的一种重要媒介。Oigenblick L.和Kirschenbaum A.将“心理地图”这一特殊教育概念引入旅游相关移民的动机分析上,极富对应切合性——对旅游地地理空间特征有一定的感知,有利于帮助劳务移民迅速融入当地生活。并且,如果回应将旅游劳务移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立场,不难发现“心理地图”对移民者有较强烈的行动号召力。但此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先期的旅行经历”是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旅游劳务移民的分析,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多数旅游劳务移民(特别是中下层旅游劳务移民)是没有机会进行“先期旅行”的,因此“心理地图”这一说法在我国目前还缺乏适用性的。但根据本土实践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学者研究中多用的“先期旅游劳务移民的个人经验”及“旅游劳务移民网络内存在的舆论作用”等,其实可视为“心理地图”说的一种替偿表述。

综合来看,上述各种劳务移民理论各有其理论侧重点,从经济性的劳务收益、劳力市场供需关系,到社会性的家庭名利、社会关系资本,再到人文性的个体心理体验及个性化的价值诉求等,呈现了对劳务移民动机复杂多重的利益体系的解构。当然我们会注意到,除“心理地图”理论与旅游劳务移民有较直接的对应联系外,其他几种劳务移民理论如何与旅游劳务移民相深入对接,还需要结合旅游相关产业的特性做进一步的探讨,尤其应着力结合能调动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一些因素来进行考量。如,某些研究者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旅游地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完善的旅游设施、便利的交通条件及惬意的生活方式等是旅游地吸引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重要原因;旅游劳务移民的从业感知和满意度,在移民地选择上也具备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小结

旅游劳务移民行动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尽管宏观来看会呈现一些时代和地域的总

体特征,但其实践毕竟是由个体来完成的,是涉及经济的、社会的、个体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综合权衡的行动抉择过程,需要转换调动多种视角来进行剖析。我国学界在相关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游客的空间流动及影响,鲜有学者探讨旅游从业人员的空间流动和行业选择,旅游劳务移民的研究无疑成为旅游研究和移民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具有前瞻性、探索性及应用性等价值。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旅游劳务移民的概念、特征、分类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为研究旅游劳务移民这一新移民群体初步搭建起一个基础平台。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该研究领域尚存不少需要进一步着力的空间,即:既有研究大多是基于旅游移民或劳务移民等宏观概念层面上展开论述的,专门涉及旅游劳务移民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具体表现为: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的概念界定还存在争议;对类型的划分存在着交叉和遗漏的现象;对旅游劳务移民群体心理的研究及对劳务移民群体内部结构改变后对旅游地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关注还比较少等。

随着中国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全面展开,旅游劳务移民已成为一种不可忽略的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但与此不相映衬的是:目前中国学界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译介国外理论多,本土化、理论创见少;尤其专门针对旅游劳务移民的个案追踪还不多,且大多数是在汉人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这也与中国多民族地区的现状和少数民族旅游产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和地位很不相称。因此,探讨有效的理论剖析工具,对旅游劳务移民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对我国旅游产业及旅游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产生学术新知和指导移民管理、旅游规划等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3) [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

[2] Linda Lundmark: Mobility Migration and sea

- sonal Tourism Employment : Evidence from Swedish Mountain Municipaliti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Vol. 6, No. 3, 2006, P197- 213.
- [3] 杨钊, 陆林. 旅游移民研究体系及方法初探[J]. *地理研究*, 2008, (7).
- [4] Edith Szivas, Michael Riley, David Airey: Labor Mobility into Tourism- Attraction and Satisfac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30, No. 1, 2003.
- [5] 杨钊. 旅游移民研究体系分析及九华山旅游劳工转移和移民研究[R]. 2005 年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6] A. J. Burkart and S. Medlik, *Touris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Heinemann, 1981.
- [7] Hall C M, Page S. *Geography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Environment, Place and Space*[M]. London: Routledge, 1999.
- [8] Allan M. Williams, C. Michael Hall, *Tourism and Migration :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ourism Geographies* 2(1), 2000.
- [9] King R. *Tourism Labor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Montanari A, Williams A M. In *European Tourism: Regions, Spaces and Restructuring* [C]. Chichester : Wiley, 1995.
- [10] Allan M. Williams, C. Michael Hall. *Tourism and Migration :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J]. *Tourism Geographies* , 2000, 2(1).
- [11] Rodriguez: *Tourism as a Recruiting Post for Retirement Migration*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1, 3(1).
- [12] Allan M. Williams, C. Michael Hall. *Tourism and Migration: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0, 2(1).
- [13] 杨钊, 陆林, 陆应诚. 九华山旅游劳工转移模式及从业感知研究[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3).
- [14] 布迪厄. 实践感[M]. 蒋华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15] D. Massey, J. Arango, G. Hugo, A. Kouaouac, i A. Pellegrino, E. Taylor, *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The North American Case*,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4, (4).
- [16] 张晓青. 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述评[J]. *人口学刊*, 2001, (3).
- [17] 唐灿, 冯小双.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 *社会学研究*, 2000, (4).
- [18] D. Massey, J. Arango, G. Hugo, A. Kouaouac, i A. Pellegrino, E. Taylor, *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The North American Case*,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4, (4).
- [19] Rodriguez V., *Tourism as a Recruiting Post for Retirement Migration*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1, (1).
- [20] Warnes A M: *Migration to and Seasonal Residence in Spain of Northern European Elderly People* [J]. *Europea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 1991, (1).
- [21] Oigenblick L, Kirschenbaum A. , *Tourism and Immigration : Alternative Approche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4).

Tourism Labor Migrants as New Urban Migrants and the Relevant Theories

HONG Ying, WANG Chen-na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 Borderland's Ethnic Minor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studies on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labor migrants(TLM) and obtained some preliminary achievements. However, most scholars have been devoted to the micro-studies of tourism migrants or labor migrants and there are no adequate studies on their implication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s in China. The future studies on TLM rely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with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TLM, especially their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Key words: labor migrant; tourism labor migrant; migration theory

[责任编辑: 陈 英]